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八二期 ——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2d)

| | |
|---|------|
| 【史海钩沉】刘少奇也念过“政变经” | 欧阳龙门 |
| 【研究报告】锻造激情的木偶——论“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 | 李月军 |
| 【文献资料】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在热烈欢迎 非法被拘捕战友胜利归来大会上的发言 | 江海云 |
| 【童年旧事】难忘那只红卫兵的脚步——从心灵幽谷走来的自由之路 | 牟传珩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刘少奇也念过“政变经”

• 欧阳龙门 •

林彪于1967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专门讲到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而且列举了不少的政变的实际例子。许多有关文革历史的书籍，都引用了林彪的这个讲话（见〔1〕，〔2〕，〔3〕，〔4〕）。有的还称这篇讲话为“政变经”（〔3〕第95页、〔4〕第77页）。

余汝信在《周恩来的“政变经”》（〔5〕）一文中指出：林彪的讲话实际上是讲“防止反革命政变”。如果要说是“政变经”的话，那么周恩来也有“政变经”，因为周恩来于三天以后的5月21日，在同一个会议上也讲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余汝信的文章附录了周恩来讲话。

余汝信的文章同时还提到了刘少奇于1967年6月27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该讲话对彭、罗、陆、杨的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也提到了“刘少奇 6 月 27 日在中共中央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说该讲话谈到了“破四旧”的问题（（2）第 68 页）。

本文要指出的是：刘少奇的这个讲话也谈到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本文将这个讲话附录于后。

首先要注意的是刘少奇讲话的日期：1966 年 6 月 27 日。是在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决定派出工作组之后二十多天，是在毛泽东从南方返回北京、否定工作组、并且和刘少奇全面“摊派”之前二十多天。在刘少奇这个讲话的前后，工作组已经进驻北京的大、中学校，“使已经出现的混乱局面略有克服”（（3）第 103 页），也是后来毛泽东指责的：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3）第 104 页）。所以，可以说刘少奇在这段时间掌握着运动的主动权，比较自信。

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的讲话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是说明彭、罗、陆、杨的问题。相对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和周恩来的“五二一讲话”，刘少奇的讲话讲得更为具体，而且专门说到彭真“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然后就讲到了“政变”，列举的政变的数字，和林彪“五一八讲话”是一致的，“亚非拉地区自六零年以来发生六十多次政变，其中有五十多次搞成功了”。刘少奇讲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周恩来的讲话并没有明白地说彭、罗、陆、杨要搞政变。而林彪则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看来林彪认为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政变的问题。搞政变的人还另有所指。

刘少奇讲话中最为耐人寻味的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各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他们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刘少奇告诫党外人士：“他们搞的政变，合你们的心意，与你们是一个味道，他们要你们拥护是可能的。我劝各位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最后，刘少奇和林彪、周恩来一样，把对毛泽东的颂扬推倒了更高的程度，认为“毛泽东思想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最新的总结。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三个人的讲话都提到了毛泽东的“百年之后”，刘少奇的原话是“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

最后，本文要提出的问题是：在林彪、周恩来、刘少奇这三个人的心目中，想搞政变、有条件搞政变的人士是谁？尤其是在刘少奇的心目中是谁？刘少奇在讲话中正面地提到了林彪和周恩来，周恩来在讲话中正面地提到了林彪和刘少奇，而林彪在讲话中正面地提到的只有周恩来，没有刘少奇。

（1）严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3）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4）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5）余汝信：周恩来的“政变经” 载《华夏文摘增刊》zk0411c

◇ 附录：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人大大会堂安徽厅

邓小平（主持人）：

中共中央今天约请在座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谈谈大家关心的问题，谈谈我们党内发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大家已经看了党内的五个文件，大家都关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现在就请刘主席同大家谈这个问题。

刘少奇讲话：

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因此，应当让我们各位党外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负责人，知道一下党内的这个情况。前几天，徐冰同志已经同各位谈了，并将党内的五个文件送各位看了，各位也举行了座谈。今天我就文件中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情况谈一下。

不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个人都是掌握我们党和国家要害部门的负责人，要害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在党内，在人民中间，都有一定的影响。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总书记，他还是北京市的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人大、政协他也都有负责的位子，并且也参加了不少国际活动，经常参加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他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参加常委会。公安、政法，书记处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徐冰：还有统战部）的事务，都归他分管或是插手管的。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历史上他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晋察冀犯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两次王明路线错误，他都有份；在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他也犯过错误；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创造性的意见也提不出。对彭真，我们批评过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评过他，我们是要把他培养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北大四清，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彭真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反对的、抵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当前伟大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彭真是坚决反对的，他极力把运动拉向右边去，拉到与毛主席思想相反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对城乡四清运动，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实际上也都是反对的。这是这几个人的共同点，就是说，当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到当前紧要关头，他们就过不去了，他们就不能不出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各种非法手段，玩了那么一些小手腕，这从“大事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迫不急待地用非法手段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方针。这不是偶然的。这件事情上，暴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彭真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也是很猖獗的，他极力争夺领导权，反对群众的革命运动，包庇坏人坏事，他对主席亲自主持的“二十三

条”，表面赞成，实际抵制，他在河北厅的几次讲话，都不是“二十三条”的精神，相反，他是要按照《前线》发刊词办事，以发刊词来领导运动。有人讲，每年要学习一次发刊词，有人讲，工作队队员要人手一册。这个发刊词，是不讲阶级斗争的。这是彭真的纲领，他要以发刊词来代替“二十三条”。华北局派工作队到北京，参加四清运动，都被他赶走了，有的地方，四清搞得好的，北京市委却去翻案，进行打击、报复。因此，北京市多数单位的四清是搞得不好的。当然还要调查一下，看看究竟有多少是基本好的，多少是基本不好的，但就现在已经发现的，都证明是坏的。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谁也不能批评，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我去插手也不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彭真领导下，北京违反中央政策，违法乱纪的事是不少的。彭真参加了一些国际反修斗争，我和邓小平同志出去，都带他一道去的，是想在斗争中培养他，但他在多次斗争中，我们亲身看到，都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我们中央写了许多反修文章，是康生主持的班子搞的，文章发表以前，我们看过，也都送彭真看，他也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反修斗争，只有一次是由他负责，当团长，参加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同去的还有康生、伍修权同志。这是一次激烈的斗争会，那时中央每天都有一个电报指示去，抓得很紧，还有其他一些同志的帮助。但是就是在这次会下，他也是表现得不够坚强的，是比较勉强地去进行斗争的。还有一次由他带队，代表党中央去参加印尼共四十五周年纪念会，他没有履行党中央讨论的任务，却用了绝大部分时间去拜访印尼政府的负责人、拜访苏加诺，对党的活动不积极参加；他在印尼共马列主义学院的演说，内容是好的，但那篇东西，是北京草拟好带去的，我也看过（康生：他也是没有提过一点意见），不是他写的。他在同外宾接触中，有多次讲话是丧失立场的，送外宾礼品，外交部是有规定的，但他代表北京送的礼品，却超过了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总理，表现了北京的特殊地位。我和周总理合送三千，他却送四千、五千、甚至五千、六千。彭真上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他在干部中多次讲，毛主席犯了许多错误。他也反对党内外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各省、市委作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中央批发了，到今年年初北京市委才不得不也作出了学习决定的通知。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阶级斗争深入到当前阶段，他就不能不站出来，反对毛主席思想，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要站出来表演，表现自己，顽固地反映本阶级的利益。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但林彪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可是他还是不满足。林彪同志虽然有病，也还管些事，研究一些问题，讲几句话。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他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有人批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住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抗拒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

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的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打入党内，打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陆定一当中宣部长的时期相当长，我们党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也反对。全国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取得很大成效，工农兵学哲学，写了许多很好的文章，这些文章关在屋子里是写不出的，没有实际斗争经验，也写不出来。陆定一反对工农兵学哲学，杨献珍也反对，他们对工农兵哲学是看不起的，冷嘲热讽，说什么“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等等。陆定一还反对毛主席著作进课堂，教科书上也是不许写的，长期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同彭真一道反对文化大革命，右派写的文章不积压、不审查、也不用批准；对左派的文章就要审查，一审查就没有下文，长期扣压左派写的文章，有的一压好几年，打击左派。他们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是只许右派放，不许左派放。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上台后，陆定一多次同外国人、中国人谈话中都是大反斯大林，不反赫鲁晓夫。这是这个人的特点。斯大林有缺点错误，但重点不应该反对斯大林，而应该反对赫鲁晓夫；陆定一反对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对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从来是反左不反右。这些问题上，他从来不请示，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搞。他对康生同志搞的反修文章是不提意见的。作为副总理，对文教口却不大管，但副总理是要当的。

杨尚昆是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当了二十多年，掌握全党的机密文件，各种重要的事情。近来发现他把党内重要机密、核心机密文件，让不少人抄走了，有几万件，不请示中央就让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国了，很难讲。现在还查不清楚。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鉴于苏联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多次决定：不论党内、党外、对中国人、对外国人都一律禁用窃听器。搞这些东西党内紧张，党外也紧张，外国人也紧张。（邓小平讲：搞窃听器，尽听一些小话，结果是自己上当，大方向要看清楚，不要靠听小话。）我们到外国去，在室内就讲相反的话，真正的话是不在那里讲的。历来党内是禁止用窃听器的，杨尚昆在五八年以前，中央开会杨是公开按装录音机录音，后来禁止了，他就秘密的搞窃听器。五九年毛主席发现了，再一次加以禁止，他还是不听，仍然背着主席搞，我们常委开会、谈话，甚至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窃听器，我们常委几个人的谈话他都知道。一九六一年又给毛主席发现了。搞这事他一个人搞不了，总还要别人来按装，要有人收听，还要放。事情暴露后，毛主席就要严加追查，是谁搞的，就要开除谁的党籍。这时杨尚昆就把机要室的主任、副主任推出来承担责任，说他自己不知道。最近发现在毛主席办公室按装的窃听器就是杨尚昆指示的，这事就不简单了，就成为政治问题了。这不是一般的纪律问题，是严重违反党纪和国家纲纪的。最近让杨尚昆隔离反省，要他交代这个问题，杨尚昆是犯了罪的。今后有些会议，要公开录音的，都要经过请示，批准；按窃听器是绝对不允许的，任何情况下也一律禁止。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

了审查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他们的企图不是个人要点什么东西，而是企图根本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要按照他们的路线办事，要按他们的面貌改造党，改造全中国，企图在中国实现修正主义政策，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就可能实现政变。

最近世界上不是政变成风吗？亚非拉地区自六零年以来发生六十多次政变，其中有五十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就是用政变的形式上台的，波匈事件，保加利亚、捷克等也都是政变性质。

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策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这次事件的揭露是党和国家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党内发生这类事件不足为奇，是正常的现象。解放后，党内发生大事件有三次：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次是第三次。历史上也有过。过去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不发生那才奇怪。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看是好事。少数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了，可以教育千百万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的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的加强了。

现在党内外，有人觉得发生这类事件不可理解，他们地位相当高，待遇也不错，权力也很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为什么要搞，是他们的阶级要他们搞，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到一定时候，就要站出来。在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下，国内的、国际的反动派要想在中国得势，必须在党的各级领导中找他们的代理人，美国在找，苏联也在找，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在找。党内一些阶级立场不稳、没有改造好的，钻到党内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温度之下就要站出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是不由自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有了大陆就可以不要台湾？！中国革命胜利就不要世界革命？！你不搞，人家要搞你，反动派要搞你，非斗不可。苏联赫鲁晓夫不搞世界革命，搞和平共处，美国高兴，但是到最后美国还是不会饶过苏联的。帝国主义之间还要打仗，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就会搞得那么好、那么一致，是不可能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搞世界革命，世界的反革命就要搞你。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阶级斗争高潮过去，会有低潮，但以后还会有更大高潮。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一直要到消灭一切阶级，阶级差别也消灭，不然总是没有完，停止不了的。不论你地位高也好，不高也好，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革命的打倒反革命，要么是反革命打倒革命的。彭、罗、陆、杨事件就是这样，要么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推翻我们，要么是我们把他们推翻，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内发生这种事解放后有三次。办法只有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用剥笋政策，剥笋政策是大革命时期鲍罗庭提出的，搞国民党右派要一层层剥掉，剩下一个笋心。你不剥他，他就剥你。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剥掉，这是一个好办法。剥不掉，他就要上台推翻我们，改变政策。一年多前毛主席对地方上、军队的一些同志说，假如党中央搞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修正主义在中央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新问题，当时他们没有准备，不好回答。毛主席说，中央实行马列主义政策，应当拥护，如果实行修正主义政策，你们可以造反。历史上造反的事情多得很，修正主义要把中国统一，是很困难的，不容易的。结果只会有二个，办法只有剥笋政策，剥不掉，搞修正主义，就应当造反。

有这么一个问题，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各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他们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个难问题。从中国的形势看，大概是这样，各民主党

派自己来搞政变是不可能的，谈不上的（陈毅同志插话：章伯钧、罗隆基是想搞政变的，但是没有力量），是没有力量，搞不起来的。但是我们党内有人搞政变，他们搞的政变，合你们的心意，与你们是一个味道，他们要你们拥护是可能的。我劝各位提高警惕，不要上当。你们如果同他们搞在一起，他们被消灭了，你们的结果是同归于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轻易表态的。

识别他们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是红旗，他们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是社会主义，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邓小平说：赫鲁晓夫也是这样，拥护列宁反对斯大林）。识别他们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是可以识别的，需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就是站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阶级的利益。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就可以识别。如果站在某一个阶级的立场上，特别是资产阶级立场或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就可能看不清，识别不清。特别是迎合你们的某些需要，就会被迷惑更看不清了。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可以识别那些违反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反党分子的面目。因此，彭、罗、陆、杨事件不是说同各位没有关系，不是说同各党派没有关系，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拥护还是造反要不要表示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增加了你们自己的责任。党内发生这个重大事件，各位是很关心的。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很广泛的革命，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但是这是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的变化。有不少党外朋友担心这个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党外也有这种当权派，不论是幕前、幕后的也必须反对。但是党外的当权派实际上不多，在幕后的恐怕多一点，我们在城乡四清运动中，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追到幕后，就是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党外的当权派是幕前的少，幕后的多，总起来讲为数不多。有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变，不知不觉地放了一些毒也要批判，进行帮助，不但是重点，对他们还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世界观要改变，但不能太急。在这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只要你不对抗群众运动，在运动中认真考虑问题，可能会改变得快一些；有些人的世界观是固定了，不能改变，只要不是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作为重点人物批判。批判的方式也要考究一些，要采取帮助的态度，团结的态度，善意的态度。如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要批判，但不能同批判邓拓、陆平一样。你们关心文化大革命，恐怕主要就是关心这点：怕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是都一样的批判。可能有些中学生、大学生乱搞一气，但他们以后也会懂得的。联系到资产阶级权威的问题，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翦伯赞、吴晗是党内的，还有是党外的。党内权威统治了学术部门、统治了一个系的情况，要改一改，不要再垄断的。不论中国和外国，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旧文化，作为体系是必须彻底攻破；但在这些文化中间，对今天人民斗争有些有益的东西，还应该吸收过来，做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的养料。对中国和外国历史上的一切旧文化，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不研究就不了解。但是，必须在彻底批判分析后，才能吸收有用的精华。不彻底批判，对什么要吸收，什么要扬弃就搞不清楚。同时，必须创造性地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仅仅吸收旧的是不够的，无产阶级还必须有很大的创造。要把旧的吃掉、消化，好的吸收，不好的扬弃。马克思主义就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要在马列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吸收旧文化中有用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都要消灭。剥削阶级的文化也要消灭，要吸收有用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搞彻底的革命。当然不是斩断历史，否定一切，这是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斗争，要同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三个差别，同时并进。京剧现

代戏沙家浜、红灯记、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就吸收了好的东西，如唱腔，动作，基本功等。芭蕾舞是外国的，是从来不敢动的。中国的两个芭蕾舞就搞的不错，这是开始，是成功的典型，发展前途是无限的，远大的。

毛泽东思想确实确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最新的总结。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完整的新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是同一个体系，是在马列主义体系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他的思想体系还会有发展，还没有完结。马克思死了，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列宁主义阶段。在列宁以后，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体系。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世界性的。当然还要继续发展，不是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如果这样，就是机械唯物论。毛主席亲自经历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比马克思、列宁多得多，斗争激烈多得多，也伟大的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继承了人类一切先进思想，创造性地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有很高的预见，预见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就去世了，没有同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重大政治战役和军事战役。列宁活了五十四岁，在十月革命后六年就死了，他是了不起的天才，也有很高的预见，他的著作是不朽的。但是，列宁也没有经过同毛主席经历的那样的长期的、激烈的，复杂的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是任何一个国家超不过的。我们是经过各种事变，胜利，失败，再到胜利，既打国内的敌人，又打国外的敌人，有公开的斗争和密秘的斗争，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的革命的经验，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它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

现在我国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功，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为革命群众所掌握，就化为极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亿万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正在改变我国人民群众的面貌，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来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说工农兵不能学理论、哲学，这完全是书生的话。工农兵写的文章，你们写不出，我也写不出，没有丰富的经验，不经过反复实践，是写不出来的。学了而且要用，要经过多次失败，成功，最后才能成功，写出文章，用毛泽东思想解释一切。山西的解悦是个细纱女工，写了一篇哲学文章，这样的文章工农兵喜欢看，我也喜欢看，文化水平不一定高，小学毕业就可以，不识字也可以，文盲的记忆力就很好，我们是把事情记在本子上，他们是记在脑子里。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就有可能尽快地改变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物质面貌。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少数人垄断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房子里搞东西，总是要错误百出的。毛主席著作有许多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用工农兵的语言，通俗的语言，写出马列主义高水平的理论著作。毛主席说，马列主义的通俗化是个大问题。通俗化是从斯大林开始的，斯大林的文章比较容易看，但是毛主席的通俗化比斯大林更进了一步，把毛主席著作给工人、贫下中农一念，他们一听就懂，不识字也懂，因为是代表他们讲的。（陈毅：毛主席著作没有学生腔。）知识分子故意把文章写的人家不懂，好象人家一懂就水平不高了，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没有解决。很高的理论水平，又能为大家很容易理解，这二者的统一，许多人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掌握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在全世界普及，但就其规模深度讲，没有象中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普遍深入。我们国家的文化、理论将出现一个繁荣的时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由此再联想到那些讲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人，会认识到应当把他们打倒。这样，要搞修正主义，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采

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企图篡党，篡军，复辟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得逞了。因此，这是防止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根本条件。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已经延期一次了，上半年是开不成了，文化革命搞的大家抽不出时间来，势必要延期。（康生同志：这是全国最大的民主。）改到什么时候开，人大常委可以讨论，是下半年开，还是明年开？可不可以改成不定期？宪法规定一年开一次，有时多开，有时少开，战争来了也可能几个月开一次，有时几年不能开，这个问题请各党派交换意见，什么时候开现在不定，请从大常委决定。（完）

小平：

两件事，刘主席讲了。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事件更大。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用剥笋的办法，是健康的现象。这样理解，就不会忧心忡忡了。文化革命才开始，连我们自己也还要经历新的改变，高校招生将用选拔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还要不断的接触新的事变，都会接触到各阶层，要经常引起内心的斗争和社会斗争，很值得大家研究这些问题。根本观点是要从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来考虑问题。

~~~~~

## 【研究报告】

### 锻造激情的木偶——论“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

• 李月军 •

作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份，“红卫兵”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及其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变迁的研究尚不多见。在“文革”前期充满激情和狂热的“红卫兵”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动荡中发挥了非常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为什么在那一代人中会产生这样的行为呢？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有三个途径，即家庭影响、学校教育和同伴影响。对“红卫兵”这一代人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认识支配他们当时行为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也有助于理解这一代人今天的行为和观念的踪迹。

本文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心理学的角度，通过考察“红卫兵”一代所处的家庭和学校环境、同辈群体、社会环境及他们的青年心理等，来分析“红卫兵”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与机制，以揭示“红卫兵”从社会政治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有政治激情而无思想的“木偶”的文化因素。

#### 一、父辈的政治地位决定了政治文化在家庭内如何传递

在“文革”前高度政治化、以“出身”论高低贵贱的社会中，家庭对“红卫兵”一代政治文化的形成非常显著。“文化延续的最佳指标，在于父母能否把这种文化的涵义、观念，清晰而

有效地传递给子女。(1)”家庭对“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文化的代际传承来实现的。“红卫兵”的家庭背景及社会政治地位不同，其政治社会化方式也有所不同。(2)

“文革”早期的“红卫兵”之父辈多为参加过战争的革命者，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父辈这一代的政治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长期积淀下来的“左倾”政治文化观，他们属于“革命的一代”和“服从的一代”。其子女这代人从小就受到父辈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家庭对这些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体现在传和承两个方面。父辈通过复述个人的经历和自我评价，把自己的认知感受、先验的革命理想、战争文化、对意志力量的崇尚等，自觉不自觉地传给下一代。在传递这些政治价值、政治观点和政治信仰、政治规范的过程中，父辈的倾向性对下一代有明显的影 响。(3)

同时，干部子女从这种政治文化中体验到优越感，对父辈的政治观念自觉地学习、体认，将之纳入自己的政治人格、政治心理、政治态度，他们往往自觉地学习、模仿父辈的观念行为，并用以观察社会。

中共高级将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的回忆反映了这种政治社会化的典型模式。她认为，父辈们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共产主义、彻底解放全人类的追求，对“红卫兵”一代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她写道：“人类历史中所有苦难，人类自身的缺陷和困境，在革命理想迷醉的孩子们的眼里，统统足能够被革命理想战胜，或者被设计周全的社会工程解决的问题。(4)”这种革命观念渗透到孩子们的心中，所以革命干部家庭的孩子们往往渴望再现父母和革命所具有的道德品质，以致于伙伴们的课余活动也受到这种革命观念的驱动。

陈凯歌对“文革”前革命干部家庭学生的心态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的味道，而无法逃脱。(5)”

1966年夏，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坚主要在干部子女相对集中的学校，这与他们在“左倾”的环境中从父辈那里吸取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系。

而在那些政治背景有“问题”或“出身不好”的、在以往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的家庭中，子女们从父辈那里得到的政治文化信息就完全不同了。其父辈通常要求子女要服从党、团组织的要求，按社会上主流的政治准则行事；甚至要子女从父辈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少数比较极端的还要求子女为了政治上的进步与父辈断绝关系，积极向主流政治文化靠拢。在这些青少年当中，不少人出于社会政治压力及个人前途的考虑，产生了反叛家庭的念头或行为，希望以此表现自己皈依主流政治的愿望，从而寻求一种理想或安全及对主流社会的归属感。

## 二、学校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革命”狂热

在任何社会里学校都担负着培养青少年学生基本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功能。在成为“文革”的先锋队之前，“红卫兵”一代主要是尚未进入社会的大中学校在校学生。下面笔者从教育方针、学校体制、校内的政治活动训练、课程设置、教师的政治观念和行 为以及校内评价机制等角度，分析当时的学校教育如何灌输政治观念和 政治文化、引导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首先，中共建国后到“文革”前，学校教育基本方针的演变趋势是越来越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随着1960年代“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口号的提出，尽管官方的公开宣示是“又红又专”，但在实际执行上则倾向于“政治挂帅”，贬低非政治知识，即强调“红”而忽视“专”。1962年9月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对青年的阶级教育，永葆国家的革命性和每一代人都具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他在1964年到1966年间又进一步要求，“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红要高于专”。他认为，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青年人将在二、三十年后“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发表了这样的指示：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按照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和要求，全国的学校都把“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培养学生的基本方针。所谓的“接班人”是当时官方对青少年未来的社会政治角色的定位，这种角色定位为青少年提供了关于“我们是谁”的集体认同感和致力于重大社会政治变迁的使命感。

第二，学校体制为“政治挂帅”提供了制度保障。学校的党委或党总支高度重视面向学生的政治组织的运作（如小学的少先队，大、中学的共青团，大学的学生党支部等），这些次级政治组织为学生提供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并将政治运作引入学生间的竞争。“从入学的那一天起，每个学生就与其同伴在这些组织中成长，并要服从组织纪律，认同自己在组织中的政治角色，习从其中的主导思维模式。”〔6〕1963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规定，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班主任工作、共青团、少先队的活动和政治课来进行〔7〕。学校的这种政治化体制把学校教育的日常行政管理都纳入了“政治挂帅”的轨道，学生的录取、其在校政治表现评价、对学生的未来前途（特别是大学生的工作分配）的控制等各方面，都服务于强化主流政治文化的目的。

第三，通过引入社会上流行的各项政治运动，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政治化训练。从建国之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运动到“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解放军”运动、“学习雷锋”运动等，学校都动员学生积极参与，藉此影响学生的政治意识、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的形成。例如，在1960年代上半期，学校普遍组织学生“吃忆苦饭”，这是“当年通行的革命教育方式，以表示不忘劳苦阶级的根本。一般认为，食物的粗糙程度和参加者革命化的决心成正比〔8〕”。这样的群体性政治活动训练提供了学生间面对面互动的场景，在教师的引导和压力下，学生们在政治活动训练的互动和竞争当中，把外加的政治文化逐渐内化到个人的政治意识之中。

通过“学习解放军”、“学雷锋”等政治运动，军队特有的政治文化（自我牺牲、对党和毛泽东的绝对忠诚、二元对立的思维、对暴力的崇尚等）逐渐渗入学生们的意识观念之中，他们的语言、服饰、行动姿态都开始军事化。等到“文革”开始时，“红卫兵”以及其他学生“造反”组织的建制很自然地就模仿军队来设置。例如，当时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团体“井冈山兵团”的组织建制就是把分属各系、处的“红卫兵”编为第1至第15“部队”，各“部队”由若干“战斗组”构成，“兵团”总部下辖总部办公室、作战部（内设对内作战部和对外作战部）、政治部、后勤部等。

“学雷锋”运动对“红卫兵”一代政治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雷锋精神”从一开始就具有道德与政治的双歧性。从道德角度讲，“雷锋精神”中的时刻想到别人、为大家做好事，如果是发乎于心的一种意愿，是值得称赞的，其中还可能包括宽容、理解等现代政治文明的因素。但如果这种原本自发的道德情感为“极左”政治文化所僭越，就可能冲出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界限，导致极端的集体主义与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双重泛滥。“文革”前“雷锋精神”所忠诚的对象经历了从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到忠于共产党、忠于毛泽东个人的嬗变过程。

“雷锋精神”的核心也被演绎成了“对阶级敌人仇恨、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个人崇拜。这样的政治文化里包含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个人崇拜观念严重消蚀了“红卫兵”一代人的个性和独立思考能力，“革命”、“献身”、“阶级斗争”、对毛泽东的疯狂崇拜占据了他们的灵魂，扭曲而空洞的理想主义充斥着他们的大脑，对革命的渴望牵引着他们的行动。

从罗点点坦率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当时在校中学生的典型状况：“这一时期，我和我周围的人对于这样的思想训练像吃错了药一样上瘾。它渐渐在我心里培育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记得第一次读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我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惊讶，因为我觉得他提倡的修养方法早已是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了。我们成了一群简单忙碌又愉快的人。每天早上起来，心中都装满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每天的生活目的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课堂上我们为革命学习，代表无产阶级攀登科学文化的高峰。课余，我们为革命锻炼身体或者为革命唱歌、读书、娱乐等等，晚上我们大写“雷锋日记”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坚持不懈的努力，渐渐使这些文章的文风、文体和语言都与报纸上发表的同类文章酷肖，后来又发现原来这种文风是属于毛泽东的，只不过是报纸和全国人民都在有意无意地仿效。夜晚灯下，我们仍然孜孜不倦，目光炯炯地检查一整天来所做所为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化的要求和毛主席的教导。（9）”那时候许多中学生的观念就象罗点点所回忆的：“这时候我们唯一的烦恼是没有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法马上检验我们对革命的忠诚和马上为革命作出牺牲。（10）”

第四，课程设置日益“革命化”。建国后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不断变动，其主题是向学生灌输“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二元绝对对立的阶级斗争观、对毛泽东和党的忠诚、放弃个人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以及爱国主义等思想。从1964年起大学的政治理论课和中学的政治课逐渐被具有严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所代替。1964年11月，毛泽东在与其侄子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中提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能算毕业生呢？（11）”随后高教部提出，“要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从而将参加“四清”运动和军训正式列入教学计划。1965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要求：必须把“学校的党组织、领导干部、教员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不是有革命化的作风；在课程安排上，是不是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是不是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作为一门主课……”，作为衡量学校能不能坚持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坚持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标准。

在这样的课程安排和授课标准下，教学内容中极度“左倾”的政治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为学生们建构了一种“红卫兵”一代特有的意识和话语体系，也塑造了这一代人当时的一种次级心理文化霸权，即以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身份（“文革”中被具体化为“毛主席的红卫兵”），“挟毛著以令天下”。与这种次级心理文化霸权相对应的，是“红卫兵”一代人的权威主义政治人格（12）。其特点是“权威主义侵犯”和“权威主义服从”，即权威主义者的“统治——服从”倾向，具有此倾向的人往往在地位较高、有权势的人面前贬低自己，而在软弱或劣势的人面前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阿多尔诺形象地将这一人格特征比作骑车人的本性——“对在上者鞠躬，对在下者踩踏。”“在60年代城市中学里，‘权威人格’已经成为这些毛主席的孩子们的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它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13）”

第五，当时教师的政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直接影响着“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从代际的政治文化特征来看，当时的教师属于“顺从的一代”，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为主流政治文化驯服，并将其价值观内化于心。他们基本上缺乏思想道德上的独立，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也无法独立，他们把主流政治文化的霸权视为当然，因此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灌输和控制机制的一部份。“学校中政教合一，几乎所有教师都是政治辅导员。（14）”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政治经验和学会的行为准则决定了他们与学生之间政治文化代际传承的特点。由于学校的高度政治化为教师增加了一层代表当局的政治教化者的“光彩”，

学生们一般对教师存在着敬畏与顺从心理，而教师则体验到行使权力的权威快感。青少年对权威的认知和子民型人格模式就在这一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这还影响到学生们对所在班集体的态度。

第六，“政治挂帅”的学生评价机制对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深刻的影响。由于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关系到学生的未来前途，“政治挂帅”的评价机制就引导着学生们在校期间力求政治“表现”。对普通家庭或“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而言，一旦校方在其档案里留下“不良”评语，他或她几乎永远也不可能为自己“辩护”和“纠错”的机会。有的学生档案被班主任写上这样的评语“此人对党和社会主义有不满情绪，建议大学不予录取（15）”。学校和教师往往利用学生评价机制和对本人保密的档案制度迫使学生顺从主流政治文化的要求。

### 三、同辈群体的活动产生“革命崇拜”和单一的政治认同

政治文化是被一定群体共享的，其群族性对它的传播与维持有重要影响。在“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同辈人群体的作用也很明显。“红卫兵”的同辈群体主要有班集体、阶级家庭背景相似的伙伴们、学校中的“政治学习小组”、少先队、共青团等。组织建制内成形的同辈群体具有制度化、正式化特征，其活动也受到教师、管理者的干涉和指导。（16）

“红卫兵”的同辈群体之间的行为和特征相似性及其频密接触交往为互相认同、形成共同政治文化提供了重要条件。1960年代初期，一些学校中的学生自发地组成“学毛著小组”，这种形式的同辈影响使学生为了取得同伴的认同而自发地把日常行为纳入“革命化”的轨道。在北京市的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四中等干部子女集中的学校，干部子女群体政治信息灵通，具有相近的政治观念、对“接班人”这一集体角色的高度认同感，他们常聚在一起讨论政治形势和感想，从而形成了彼此之间的政治认同感与从属感等。后来“红卫兵”从这些学生里发源显然与此有关。此外，许多学生还自发地组织群体性的“向往革命”之类的活动，如编演歌颂“革命”的文艺节目、参观革命“圣地”、举办“革命”的纪念性集会、“重走长征路”、模仿毛泽东等领袖的行为等。这些活动本身具有凝聚同伴、产生群体认同、造成观念一致化等效果，并通过再现“革命”历史来形成共同回忆和政治认知，并排除或中止异质的记忆。面临群体压力，学生们有很强的从众心理，通过相互模仿、唤醒、感染等形式，“从有意操演的回忆和复活原型的活动中得到有价值的思想（17）”，从而使个体与同辈群体贴得更近，群体的政治文化也得到传播与强化。“革命”就是这样在同伴的自发活动中被进一步神化的，而“革命干部”子弟借此机会也在同辈群体中树立起以“政治优势”为基础的权威地位。后来“红卫兵”组织及其头目的形成与“文革”前干部子弟的自发性群体活动有密切关系。

### 四、社会政治环境对青少年的全面压力

人们的政治记忆与文化的形成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红卫兵”一代生活在封闭且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里，日常生活已经严重泛政治化。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使青少年的头脑高度简单化，他们几乎接触不到多少与政治宣传无关的信息。这样，本来就十分单纯的青年一代更不容易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思考，结果造就了政治上盲从轻信的一代。“文革”前，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化，“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18）”。青少年本来就缺乏足够的独立识别和判断力，很容易成为接受大众传媒传播内容的“容器”。在“政治挂帅”的高压下，他们就更没有别的选择了。同时，学生们在课外所能接触到的主流文学作品基本上是政治宣传品，如《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欧阳海之歌》、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等。青少年被置于无法自我选择的文化空间里，主流政治文化就通过业余阅读悄无声息地注入青少年的心田，驯化了整整一代人。

同时，当局还要求他们参与各种政治和道德教化运动，以此作为政治训练的场所。在这些活动中，不是养成学生们独立的政治人格，而是把他们当作“思想改造”和“政治受训”的对象，培养他们对政治体制和领袖权威的顺从与依附。例如，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指出，如此安排之目的是“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觉悟，进行世界观的改造（19）”。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等学校的22万余名师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起，在少数高等学校和140余所全日制中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进而开始部署面向学校的“社教运动”（20）。这些政治运动对“红卫兵”一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有很深的影响。在“红卫兵”一代的各项社会技能中，参加政治运动、从事政治动员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这种在社会环境中组织的政治训练等于是为他们完成了“文革”的“预备役”演练。

## 五、青少年心理对“红卫兵”一代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文革”前的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人格尚未形成的成长期，此时他们的自我意识不断加强，渴望得到成人的认同，容易受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爱慕虚荣，不仅具有浪漫情怀而且更渴望献身正义，充满激情却又极易走向极端，富有理想却分不清梦幻与现实，有独立反叛的倾向又极易模仿和盲从冲动。当时那些“革命化”宣传训练最容易征服的就是具有上述青少年心理特征的人群。他们的心灵犹如一张被风吹动而又等待着色的白纸，“文革”前那具有强烈色彩特征的、在高压下实施的政治训练和教化，那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与理想主义、革命化、阶级斗争的政治教育，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们政治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领地，几乎没留下一点空余的地方。“影响每一代的集体记忆的主要是他们相对年轻的时期的生活经历（21）。”属于这一代的卜大华回忆道：“对内‘四清’，对外反修防修，这一切都对我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64年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更使我们激动不已，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政治”、“接班人”、“修正主义”、“红色江山”、“阶级斗争”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和血液，迎着 we 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仅仅再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年做人的道德标准”。政治运动“将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的清教徒式的极端生活方式推及整个社会。而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青年时代（22）”。

政治社会化一旦完成，青年人初步形成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就有了惯性，他们会在人生相当长的时期里按照这一观念和思维定势来认知政治社会现实。除非受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或外来异质政治文化的冲击，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这种观念和思维定势是难以改变的。尽管这样的观念和思维定势实际上常常经不起逻辑上的挑战，但它既然已内化在青少年的头脑中，而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又决定了他们一旦相信了这些价值观就习惯于受其支配，所以“革命神圣”之类的观念和思维定势就具备了无与伦比的“精神原子弹”那样的力量。“文革”时期有不少红卫兵到江西省井冈山参观过革命圣地。后来有人这样回忆道：一农家儿女为他们做了顿当年慰劳红军的红米饭，南瓜汤，还特意为我们多加了几个咸鱼干。那一餐饭香极了。那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革命成功30多年了，为什么老区人民还那么贫困？革命给了他们什么？那是可以怀疑一切的时代，你可以怀疑某人是反革命，可以怀疑某人对革命不忠诚，唯独不能怀疑伟大领袖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革命。一丝怀疑的念头也不能有，更不用说喊出口。（23）

## 六、余论

在“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他们的长辈、学校和同辈群体都把基本相同的政

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到他们身上，生硬地塑造着他们的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其政治文化的内容趋同、结构单调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的酝酿、发展及其影响过程充分渗透着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上层主导政治文化，其目的是强行改造青少年学生的政治文化观念。从青少年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心理文化特征和所处的社会与群体环境，都使他们面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只能吸取而不能排斥，这就强化了主流政治文化对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从这两方面看，与其他世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青少年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红卫兵”一代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就是这样塑造了这代人的行为和心理特征。

青少年学生的心理与人格特征远未定型，他们本不应该在以成人为主的社会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文革”初期，年青幼稚而又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被塑造成充满“革命狂热”的“红卫兵”一代，却被利用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文革”前的政治社会化把具有动员性、革命性、二元对立性等特征的政治文化内化到他们的意识之中，为他们设定了所谓的“革命接班人”的社会政治角色定位，刺激了他们原有的对成人角色的渴望感，更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责任感；阶级斗争教育使他们对“革命”有无比的向往甚至崇拜感；动员型政治文化刺激了“红卫兵”的反叛意识、张扬个性的心理及表演欲，唤醒了他们在权威体制造成的压抑感下的独立意识萌动；主流政治文化制造的政治危机感、焦虑感与仇恨意识也被内化到青少年学生中，变成了他们的心理渴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满足放大了他们的偶像崇拜需要。动员型政治文化与“红卫兵”一代青少年心理的相互激荡、积累，把作为微观个体的“红卫兵”联合成一个同质群体，使“红卫兵”们产生了体认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共享激进政治情绪，进而将之投入到“文革”这场社会政治运动中去。

“文革”爆发后，学校、教师、上级等外在约束和管控消失了，各级权力中心出现纷争与缝隙，“阶级敌人”又被制造出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通过政治社会化积累起来的阶级斗争、对立仇恨、对革命的渴望、权威体制造成的压抑等如同长期埋藏在地底的岩浆突然找到了喷发口，“红卫兵”冲上了毛泽东搭起来的“文革”大舞台，被推到了社会政治运动的前沿和中心。他们的社会政治中心的角色其实只是表面上的，是政治权力意志支配的结果，“红卫兵”终究只是拱卫“元帅”的“士兵”，只不过是政治高层权力政见纷争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激情“木偶”。本该处于社会政治边缘的青少年突然被置放在社会政治运动的中心，一度以“毛主席的革命小将”的身份充当了只有成年人政治权威才能扮演的角色，这导致了“红卫兵”在文化和社会政治角色上的双重错位。

通过多种政治社会化途径形成的“红卫兵”政治文化只是当时社会政治之树结出的一枚畸形果，其强烈的反社会、反文化色彩决定了它必定是短命的。它试图以极端的反叛形式来表达与“敌对阶级”的分野，其“敌人”实际上是主观制造的；它疯狂地冲击传统文化（如“破四旧”），但“越是激烈地拒绝一切旧事物，就越是依赖过去（24）”；它把仇恨情结看作冲决罗网的动力，结果是拥抱了“仇恨”这个自由民主的天敌；它宣称自己的理想是要解放全人类，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狂想当作裁决一切的普遍真理；它认为自己的反叛是正义的，但后果却是背叛了正义；它以集体主义始，却以无政府主义终；被称为“初升太阳”的“红卫兵”们刚刚“升起”，就为自己的“光芒”灼伤。“红卫兵”运动后期出现的“逍遥派”和“输出革命”，折射出“红卫兵”群体当中出现的两种极端政治心态，是其政治文化能量耗尽的表现。那些“革命”激情无从发泄的失势“红卫兵”们茫然面对现实和未来，极少数人把加入“缅甸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当作无奈的“革命”出路，还有一些人则把期望爆发中苏战争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

当毛泽东最终把整个“红卫兵”群体交给“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去“再教育”后，

“红卫兵”群体的“革命”激情终于在生存的艰苦挣扎中磨尽了。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下岗失业潮当中，还能看到“红卫兵”一代政治社会化的痕迹。在这代人的话语当中，这样的痕迹今后还将继续存在。

#### 注释

〔1〕〔美〕理查德·弗拉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2〕Xiaowei, Zang,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Westview Press, 2000, Chpt.5.

〔3〕王卓君，《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版，第212页。

〔4〕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13页。

〔5〕陈凯歌，《少年凯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39页。

〔6〕Jing Jin,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p.123.

〔7〕苏渭昌、雷克啸等，《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8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272页。

〔8〕出处同注〔4〕，第117页。

〔9〕出处同注〔4〕，第118至119页。

〔10〕出处同注〔4〕，第118页。

〔11〕见《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86页，文革印刷品，无出版单位与日期。

〔12〕见 Theodor Adorno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nanda”, in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51, p.103.

〔13〕〔澳〕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中文版，第3页。

〔14〕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15〕出处同上，第155页。

〔16〕出处同注〔4〕，第126页。

〔17〕〔美〕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4、71页。

〔18〕〔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等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12页。

〔19〕高奇，《新中国教育历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20〕出处同注〔7〕，第272页。

〔2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68至69页。

〔22〕卜大华，“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中国青年》，1986年第10期。

〔23〕马利，“头顶上的‘圣坛’——徐丫丫自述”，载于辉的《红卫兵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24〕出处同注〔17〕，第71页。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91期）

~~~~~  
【文献资料】

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
——在热烈欢迎非法被拘捕战友胜利归来大会上的发言

• 江海云 •

（原编者按：江海云同志（女，二十一岁，共产党员，工人子女）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是坚强的八·二六战士，是革命的硬骨头。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江海云恨之入骨，他们把江海云打成“反革命头目”，“罪魁祸首”，非法监禁，残酷迫害。

保卫毛主席，何罪之有？江海云同志在狱中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能有这样的“反革命”吗？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红心忠于毛主席！能有这样的“反革命”吗？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革命为光荣，生死置之度外，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冲锋陷阵。

江海云同志的讲话是对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愤怒的控诉、无情的鞭挞！公安局中一小撮充当镇压革命小将刽子手的“英雄好汉”们，你们欠下的账我们是一定要清算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决没有好下场。）

亲爱的同患难共甘苦的战友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战友们：

你们辛苦了！狱中的战友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重新回到可爱的川大，我无比高兴，无比幸福！让我们一千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要控诉省公安厅黑司令部对我的迫害。

二月二十三号晚上，下着大雪，我就是那晚上入狱的。公安局的人是从十九中把我带到公安局的。到了后，一个大胖子对我说：“你人小野心大，干的坏事多！”我问：“我们啥子罪状？你们凭什么抓我？”他说：“你的罪状多得很，我要杀了你！”我说：“你杀了我，毛主席饶不了你！”他说：“你还凶，还猖狂，好反动！”叫把我的衣服剥下来，另一个人不叫剥，就把我捆了起来，送到××监。在狱中，他们对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甚至没有学习毛主席语录，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由！

他们说我在狱中闹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闹了什么呢？就是这么几件事：

狱中一个孕妇快小产了，情况很危急，我就哇啦哇啦地叫，要医生快来，他们就说我有意煽动，这是一条罪状；《红旗》五期社论发表后，听到街上在游行，就向他们要，不给，我们就叫：“我们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他们说这是又一次有意煽动，就是第二条罪状；同学送来了毛主席著作和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我向他们要了十二次，都没有给我，说语录上批了字，不利于我反省。我问：“你是相信那钢笔字呢？还是相信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他答不上来，却说：“对于你们，没有民主。难道人都可以拘，书就不可以拘吗？”我就说他害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登载郭嘉宏英雄事迹的前一天，公安局一个啥子科长来训了一次话，说，你们的性质已经定了，你们就是反革命！群众把你们抓来，就要好好反省，交待才是唯一

出路。我在下面笑，冷笑，他说：“你笑什么？站起来！”“站起来就站起来！”他又要我立正，我就昂起头，挺起胸，偏不立正。他没法，就恶狠狠地说：“江海云，这笔账是要跟你算的！”果然第二天就算账来了。也完全是冤枉塞进来的一个难友，明明是贫农出身，证明上也是贫农出身，他们却偏说成地主出身，我就跟他们辩论，他们说我就是反革命，没有权利管。我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是要管！”后来另一个人就用脚踢我，我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说：“什么文斗武斗？对于你，就是要斗，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什么是乱说乱动？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才叫乱说乱动！你给我分析，我哪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分析不出，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啥要闹。我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是要闹！我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就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哪个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反对他！他说：“你好嚣张！好反动！”他又讲不清我有哪一点反动，说日本帝国主义那时比我猖狂得多，我当即指出，他立场根本错了，我要他跟我到中央首长面前辩论，他说，你算得什么？我说，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他说：“你还是红小兵啊！把她拷起来！”就这样，把我单独拷了五天五夜，连书报都看不成！这还不算，又组织扒手、小偷到监狱来斗争我，斗了两个半天，我说：这个监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这也是一条罪状。我说“八·二六”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也是一条罪状。我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也是罪状。他们说专门煽动，勾引人家往火里跳，说：不要看我年纪轻，其实坏得很！说：“你反对我越起劲，就说明我们干得越好，我们就感到越高兴！”我们唱语录歌、朗诵语录，他们就来镇压，就骂我们，要揪头头！他们出去后，我又唱“下定决心”，他说：“你的决心还没下够哇！共产主义监狱还存在，你就顶嘛，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但是，毛主席救了我！

放出来时，他问我：“你打算怎么样？”我回答说：“老子就是要造反！准备第二次进监狱！因为马克思说过，我们要经过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国内国际冲突嘛！谁晓得资本主义还会不会复辟呢？”不久前，保皇狗还在骂我：“江海云闹嘛，枪毙还不够条件吗？”资本主义复辟，就有可能。搞革命就要有这种思想。

在监牢里，很多难友斗争得很英勇，很坚决，别人来镇压时，他们就唱语录歌，高声朗诵主席语录。

难友们还在战斗，我们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定能胜利！公安厅、公安局这个黑司令部一定要砸烂！一定能砸烂！

这次还是要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教育，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使我懂得了以前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我原来就想不通，为啥子要抓我呢？现在才搞通了，因为我要革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他们就要镇压。这些道理都是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的，我也饱饱地尝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深深地懂得了，如果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就是拼下这条命，也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相信，胜利一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让我们战斗到最后，不管产业军，不管大大小小的黑司令部都要彻底砸烂！

胜利一定属于顽强战斗的革命人民！

（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改，原载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1967年4月14日出版，4月22日再版。）

◇ 附消息：江海云病逝

近日得到成都朋友电话告知，江海云于今年（2006）元月16日（星期一）上午11时43分去世，享年不到60岁。

江海云，女，1946年生，江苏无锡人，“文革”时为四川大学数学系学生，中共党员。“文革”爆发后，这个出生于工人家庭的女学生，热情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到“文革”造反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政委，在四川“文革”舞台上名震一时的风云人物。因其个子矮小，被人取了个数学味的外号：根号2。在四川“二月镇反”中，因其领导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参与围攻解放军成都军区，于1967年2月23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入狱。后获释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与被镇压的四川造反派一起得到平反。1967年底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主任。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1973年7月17日任重建的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文革”结束后被清查，被撤职并开除中共党籍。后在四川省科技情报所从事技术工作。担任数据中心主任及两个高科技公司董事长，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学术带头人等。其工作成就及优良作风得到各方好评。

因在长期辛勤工作中积劳成疾，江海云已患肝癌多时，但她从未对人说起，一直像焦裕禄那样带病埋头工作。直到元月12日还在工作。当她终于主动提出去医院后，已经病情十分严重，住院不久就处于昏迷状态，终因抢救无效，永远卸下了工作重担。

今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发动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江海云的骤然去世，给“文革”历史的总结与研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余 樵）

~~~~~

【童年旧事】

难忘那只红卫兵的脚步  
——从心灵幽谷走来的自由之路

• 牟传珩 •

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童真时代的那种甜蜜，那种宁静，那种任性生活，骤然就被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轰陷了。那天我从学校归来，刚踏进胡同口，就发现家门楼前聚满了人，心便突突地加快了跳动。我不顾一切地跑到家门，扒开人群，冲进院内，顿时被眼前终生无法忘却的惨景惊呆了：院里站满了烟台第四中学学生。他们都是由小姐班主任赤老师带来的红卫兵。当时他们班上流传我家“四旧”多，便来破“四旧”。那天父亲痛心疾首地站在墙边，家人都象霜打了的残叶卷在角落上，东厢屋的地主婆，躲在自家紧闭的门玻璃后，惊吓的两眼透出恐惧的目光。院子里遍地都是父亲珍爱如命的，即便家境再窘迫，也未舍得卖掉的古瓷瓶碎片和被摔破的银镲、花盆、残花等。那些被付之一炬的名贵字画、书籍和父母珍藏多年的民国时期老照片，以及父亲印有孙中山头像和民国国旗的大学文凭与律师证，被烧焦的隐火正散发着呛人的气味；那被掀翻在地的鱼缸旁，几条鳞片还在阳光下闪亮的金鱼，已奄奄一息。我忽见有条“金珠鳞”的鱼腮似在扇动，还有气息，便心痛地想扑上去救它，但一只红卫兵的脚步，猛地踏了上去，并用脚尖狠狠地一碾，血淋淋的鱼肠子飞溅在地。那一刻，我一个完整的童真世界霍然崩裂了。我受了刺激地大喊：“这是我的鱼啊，你们要干什么呀？”父亲上前一把把我扯了过去，擦着我的眼泪。但那只“红卫兵的脚步”，已深深地烙在我终生难忘的痛苦记忆里了。也许我的“自由之路”，从那时起就已经潜在我心灵的幽谷里了。

从那之后，一个焚烧人性与文化的黑暗时代开始了。我每天都能在马路上见到如同袭击我家的那种景象，不时地看到有戴高帽、挂砖头，嘴角上被打出血的知识分子，在街上颤抖着挨批斗。我们胡同头上有一家市委党校老师，夫妇双双不堪屈辱，上吊自尽，那“吊死鬼”的形象，让我联想起姨母讲过妖祸人间的故事情节。

那是一个“红色恐怖”的年代，东厢屋的所谓“地主婆”，在街道受管制。她每天都要向专政机关交待自己或揭发他人“罪行”，整日吓得提心吊胆，唯唯喏喏。有一天她被逼得没的交待，竟编出谎言，说我们家煤池里传出发报机音响。当地派出所立即查抄了我家，掀了煤池，并将父亲带进局子。这“莫须有”的事件，惊坏了我们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性的威胁和全家人为父亲担惊受怕的滋味。好在24小时后，父亲又被放了回来。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生活在令人恐惧，随时都可能陷入生命的灭失和家庭分崩离析的深渊里。在我们家最早被单位群众专政的，便是在市财政局工作的大哥，而他的“罪名”竟是爱好养花字画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天他的家突然被查抄，人被关押，接着便被戴了大纸帽子，胸前挂着字画，身后拉着一地排花盆栽花，到处游街示众。那晚上，父亲急地叫来了大嫂，一家人紧张不安地聚在一起计议大哥的事，但不让我们孩子听。那种凝重而恐惧的气氛，让人想起就心跳。当时我只能从门缝里偷听。大嫂说，大哥藏在阁楼里的许多日记被抄走。那可是个“文字狱”的年代，即使一段平常文字，都会被鸡蛋里挑出骨头，何况大哥肯定在日记中发泄过对“文革”的不满。为此，父亲说得设法通知大哥，让他心里有数。二哥出主意说，在馄饨中包张布字条，借送饭的方式递进去。大家采纳了二哥的意见。后来听大哥说，那馄饨他分了一半给同关一室的同事高芳彤吃，结果字条被高吃到了。幸亏他与大哥是挚友，且一向崇拜父亲，没有告密。高芳彤曾在民国时期任过报社编辑，文学功底较深，后来成为烟台知名的剧作家。记得他当时写过《屈原》剧本，请父亲审读，父亲还读了一场戏给我听。

随后的一段日子里，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成立各种战斗队，写大字报，批斗老师，全国大串联，积毛泽东头章，跳忠字舞，直到“文攻武围”，全面武斗，军队支左，天天游行。那真是全民跪着造反，用奴性反奴性的疯狂时代。在“文革”的漫漫长夜中，二哥所在的烟台机床附件厂因备战所需，远迁“三线”。二哥、二嫂被迫告别父母，举家随厂迁址内蒙呼和浩特市。二哥到呼市不久，便遭遇了一场政治冤狱。他所在的厂区发生了“反动标语事件”，专案小组在全厂职工中对笔迹，由于二哥没弄懂办案小组的意思，照标语的内容留了笔记，结果竟被立即关进监狱。消息传来，全家震惊，人人揪心，红色恐怖再次袭击了这个家庭。四个月后，警方破了案，二哥才得以获释。在那个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一台不断地加工敌人的机器，毛泽东就是这台机器的操手，任何理由都可以对人实施专政，那种人人失去尊严与自由的现实，也是诱发我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劈荆斩棘在自由之路上的一种社会原因。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